



# 学习、审干、民主检查： 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整风运动<sup>\*</sup>

**内容摘要** 山东的整风运动自1942年开始至1945年结束,主要包括学习与审干两个方面。随着运动的深入,至民主检查阶段达到了高潮,且由于罗荣桓的制止未发展成大规模的肃反。整风审干,本质上是中共组织的一次纯洁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一元化在山东的推行。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确立了其在中共毫无争议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山东的整风中,既突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也强化了罗荣桓在山东的领导地位,巩固了山东一元化领导的成果,确保了延安对山东的绝对领导。

**关键词** 山东 审干 整风运动 民主检查 罗荣桓

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中共的一个特点便是善于发起和组织运动。抗战时期,中共掀起的各项运动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整风。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拉开了中共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sup>①</sup>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当时的延安“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并明确提出通过整顿学风和党风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sup>②</sup>至次年2月,毛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整顿文风以反对党八股,“对主观主义和宗派最后地‘将一军’”。<sup>③</sup>自此,中共开始在全党内进行整风运动。山东作为一个地方根据地,整风运动开始得较晚,激烈程度也无法同延安相比。但同其他根据地相比,以往的研究多认为,山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唯一一个没有开展抢救运动的地区,而抢救运动恰恰是延安整风的高潮。早在1960年,罗荣桓就总结:“我们的整风没有搞得像延安的‘抢救’那样。”<sup>④</sup>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也称罗荣桓抵制了延安的“抢救运动”。<sup>⑤</sup>此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组织、动员与武装斗争:1925—1935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4JJD770033)的中期成果之一。

①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

②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287页。

③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0页。

④ 《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88页。

⑤ 王力:《毛泽东谈罗荣桓》,《春秋》1989年第2期,第19页。

后,无论是经历者的回忆,还是党史研究论述,基本都认可这一点,尽管还需要商榷之处。<sup>①</sup> 诚然,罗荣桓在期间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也与整个山东根据地的情况密切相关。

## 一、学习：整风运动之发轫

1942年初,延安关于开展整顿“三风”的决定,首先得到了北方局的积极响应。北方局提出要在干部教育中贯穿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精神。<sup>②</sup> 但是,整风是毛泽东的一项创举,运动如何开展还需要延安方面进一步说明与部署。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列出18篇重点学习文件,规定学习时间为各机关三个月,学校两个月,然后开始检查工作,要求每一个学习者“要深入地研究,热烈地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并对学习讨论文件的具体方法、参与人员、运动目标等也作了具体说明。<sup>③</sup> 这18篇学习文件,包括斯大林的2篇,刘少奇、康生、陈云各1篇,其余均与毛泽东有关。显然,整风运动的第一步便是展开学习,特别是要求全党学习领会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随后又增加了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4篇文件作补充,正式形成了整风的22篇文献。<sup>④</sup>

当延安开始推行整风运动的时候,正值刘少奇入鲁解决山东的领导问题。在刘少奇的指示下,1942年4月,分局书记朱瑞在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整风的报告,并对山东工作进行了检讨,列举了工作中“三风”不正的表现及其危害,提出加强调查研究和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和团结,开展严格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sup>⑤</sup> 随后,分局也向山东全党强调了整风的重要性,特别是山东“经济特别落后,小生产占绝对优势,所以“三风”在党内严重存在,必须开展整风运动,提高党的马列主义水平”。<sup>⑥</sup> 在刘少奇主持下所形成的山东四年工作总结中有如下记录:山东党需要改正错误,首先就要进行整风,一切工作的转变“必须从彻底转变党工作作风开始”,开展全党及党外的整风学习,将整风学习与具体工作相联系,对工作进行彻底检讨,“消灭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尤其在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中,应以以身作则模范的学习、严正的自上而下的自我检讨,领导全党的学习与整风的进步”。<sup>⑦</sup> 可见,刘少奇的山东之行,拉开了山东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序幕。

1942年5月8日,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整风“首先必须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中宣部所规定的文件,把握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要求山东全党研究与讨论中宣部所规定的22号文件,除此之外

① 早期的研究多认为“山东根据地整风的过程是与全党整风运动相一致的”(申春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东岳论丛》1985年第4期,第103页),最近的研究则强调了山东的不同,特别突出了罗荣桓的作用(周绍华:《罗荣桓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泰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黄瑛:《罗荣桓实事求是领导山东整风运动》,《党史博览》2017年第9期)。但以上观点均有所偏颇,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此外,程斯宇的《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4期)一文,考察了中共在整个华北的整风情况,对山东整风也多有涉及。

② 《中共北方局积极进行调查研究与整顿三风 发表关于五五学习节的通知》,《解放日报》,1942年4月13日,第1版。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367页。

④ 《中央宣传部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194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第371页。

⑤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山东编年史》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9页。

⑥ 《用脱裤子的精神回答中央整顿三风的号召》,《大众日报》,1942年4月16日,第1版。

⑦ 《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1942年10月1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1942.9—1943.7),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85页。

“华北、华中及分局各负责同志有关整顿‘三风’的论文和报告及各地整顿‘三风’的经验,也可作为参考资料”。整风学习的时间规定为5个月,学习方法上要注意制定研究计划,逐件精读细嚼并做笔记,有疑问要及时向上级请教,学习组长要随时督促检查,此外还要以小组为单位,组织讨论,遇有争论问题要及时上报反映。此指示的发布标志着山东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展起来,整风的第一步便是学习文件。<sup>①</sup>为促进干部学习,刘少奇亲自组织了一个短期学习班,以作报告的形式进行授课,讲授了《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山东工作问题》《人为什么犯错误》《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论党内斗争》等,既有延安要求的整风文件,也有与山东有关的指示报告,以实际行动推动整风学习在山东的进行。<sup>②</sup>

整风运动开始时,中共在山东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实现统一领导。刘少奇多次批评朱瑞等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要求用整风的精神加以克服。因此,有学者提出:刘少奇到山东来解决领导间的分歧实际上就是一次领导干部的整风。山东整风首先解决了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这是山东整风的重要特点。<sup>③</sup>北方局也提出山东的整风运动,应先从山东分局开始,“以身作则领导山东全党整风,切实进行自我批评,以改进山东党的领导工作”,应坚决改进领导工作,进行整风运动,“揭发领导机关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严重的‘三风’不正现象”。<sup>④</sup>当时不少根据地出现了整风“整下不整上”的问题。但在山东,整风运动与推进领导一元化是同时进行的,整风是从领导层展开的,大大推动了山东的领导走向统一。为此,山东又增加学习关于领导一元化的指示文件,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实现党统一领导问题的彻底解决。<sup>⑤</sup>同时,促进团结是山东整风的重要内容之一,山东分局就提出:整风学习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干部思想上的“山东各地区的特殊性、独立性”以及个人自尊等宗派主义的表现,以增强党的团结。<sup>⑥</sup>

早在1942年初,毛泽东提出整顿党的作风时,便要求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sup>⑦</sup>1942年6月,中央军委又决定将整风进一步在军队中展开,认为“过去一个时期的主观主义曾经给部队一些影响,在我们部队里‘三风’不正的现象是存在的,特别是‘老子天下第一’,宗派主义的思想更为明显”。<sup>⑧</sup>7月,《解放日报》刊文指出抗战爆发后,部队加入了大量新成分,加之统一战线的环境,部队“被带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要在军队中整顿“三风”,推动团结。<sup>⑨</sup>在此期间,罗荣桓主要领导一一五师的整风学习,对部队反复强调“要认真学习文件,正确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改进学习方法及加强学习。在罗荣桓的领导下,一一五师整风运动进行得相对较好,八路军

①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中央整顿“三风”指示的决定》(1942年5月8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1941.12—1942.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283页。

② 李欣:《师傅是在自己的作坊里带徒弟的——忆朱瑞》,郑建英编:《怀念朱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③ 黄瑶:《罗荣桓实事求是领导山东整风运动》,《党史博览》2017年第9期,第36—37页。

④ 《附:北方局对山东工作的总结和指示》(194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0页。

⑤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讨论中央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的决定的指示》(1942年12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88—489页。

⑥ 《总结学风学习 开始党风学习》,《大众日报》,1942年11月5日,第1版。

⑦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3页。

⑧ 《中央军委与总政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194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第396—397页。

⑨ 《关于军队中的整顿三风》,《解放日报》,1942年7月14日,第1版。

总政治部还于1942年9月17日,将一一五师整风学习的经验,转发给各战略区参考。<sup>①</sup>整风在部队的进行,有助于一一五师与山东党、山东军区改善关系,为领导一元化在山东的推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山东整风开始后,在分局、一一五师和省战工会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建立学习中心小组;分局还成立了学习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sup>②</sup>,由朱瑞、萧华、陈士榘、赖可可、陈沂5人组成,朱瑞兼主任。<sup>③</sup>县以上党委都成立了学委会,将党员干部按其职务与文化水平分别编入甲、乙、丙三组进行学习。山东纵队(山东军区)及一一五师也分别成立了各级学委会,领导各自的整风运动。1940年春,延安曾发出通知,要求干部实行每天平均两小时学习制度。不论行军打仗如何频繁,都要利用空隙时间学习,如果有几天没有完成,就要在后几天补上。当时,山东主要是学哲学,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整风期间,又增加了22篇整风文件。<sup>④</sup>当整风刚开始时,不少根据地“把整风看成一般的学习运动”<sup>⑤</sup>,继续沿用了干部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山东纵队政治部就要求:“干部两小时学习时间,均应以研究二十二个文件为主。”<sup>⑥</sup>这种学习制度,客观上在战争环境下难以保证,主观上往往依靠干部自觉。实际上在职分散整风学习的效果很不理想,山东分局就承认:“因干部水平低及敌后环境,原订计划屡经修改,三个月分局、师直始完成学风的学习。各战略分区学习仍时热时冷,一遇战斗便会中断(学习与工作及斗争脱节)。”<sup>⑦</sup>

为弥补分散整风学习的不足,北方局积极提倡干部集中整风的做法,认为其优点在于“使实际工作中的干部,得到专门阅读文件、思考问题、整理工作、反省自己的相当机会”。<sup>⑧</sup>山东分局也在实践中发现“整风学习在教育机关、学校一般较好,在党校收效最大”。<sup>⑨</sup>因此,山东大批干部被纳入学校进行整风。随着一元化与精兵简政的进行,大批干部也离开原工作岗位,除了退伍、下放基层等分流方式,进入学校学习也是一项重要选择。据王兆相回忆,1942年8月他被山东军区派往山东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党校开课后,朱瑞亲自作整风动员报告,要求干部学员“以整风的精神来检讨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逐渐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变成我们每一个干部的行动指针”,并且“不要把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别人,要多检查自己,多做自我批评”。党校主要学习延安规定的22篇整风文件,其中重点学习的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sup>⑩</sup>

1942年11月,山东分局在《大众日报》上公开宣称通过整风“提高了我们全体同志对学习的热情和学习的情绪,过去最不爱学习的人,现在已开始学习了。在实际工作中,不忘读整风文件的人

① 刘汉等编:《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页。

② 罗东进等编:《朱瑞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③ 郑建英:《朱瑞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④ 华楠:《征途感录》,长征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⑤ 《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加强整风领导的决定》(1944年1月1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894页。

⑥ 《山东纵队政治部关于整顿三风的指示》(1942年6月10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1941.12—1942.8),第364页。

⑦ 《朱瑞、陈光、罗荣桓关于山东情形给刘少奇并党中央的报告》(194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502页。

⑧ 《中共北方局关于整风经验的介绍》,《解放日报》,1943年8月2日,第1版。

⑨ 《朱瑞、陈光、罗荣桓关于山东情形给刘少奇并党中央的报告》(194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502页。

⑩ 王兆相:《战争年代的记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271页。

是相当多的,有些同志在学习后都说:“这是入党以来第一次受最好的教育”。<sup>①</sup>但根据山东分局给延安的报告,整风第一阶段的学风学习较好,进入第二阶段的党风学习即较松懈,最主要原因是“学委在领导上(组织与思想)抓不紧。其次学习的动员也不深入。方法上与工作斗争相脱节,形成单纯学习,故难持久,且鲜实效”。<sup>②</sup>除了主观原因外,客观上自1942年底至1943年初,中共在山东一直忙于统一领导,机构调整,干部流动大,学习自然难以保证。而且山东距离延安较远,不易及时获得延安的相关指示。李维汉就提到延安曾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党史,但最后山东只收到了7本,其余的在路上都被其他根据地截留了。<sup>③</sup>在山东的一些根据地,获得整风的相关材料也很困难,例如在鲁南,部队不得不在晚上去山顶架设电台,通过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来记录《反对党八股》等材料。<sup>④</sup>由此可见,整风开展的困难程度。

随着山东军区的重组与一元化领导在山东的确立,山东的整风由罗荣桓统一领导。1943年4月3日,延安发出指示,认为:“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他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决定用一年的时间继续开展整风,在各根据地,“责成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依据战争环境特点,重新做出自己的整风计划”。<sup>⑤</sup>对于延安的批评,山东分局承认整风在山东“始终未造成一个全党均学习热潮。自去年备战以来,除少数地区少数干部外,一般均已陷于无形停顿”,并于4月18日提出重振整风学习,将干部分为三类:上层干部重点重新学习学风;中级干部仍学习党风,辅之学习时事,学习业务;下级干部以学习业务,学习本地本部门工作,辅以整风读本。学习方法是每人每天两小时学习与小组集体学习讨论相结合,计划自5月起用8个月的时间完成学风学习。<sup>⑥</sup>5月,山东分局又拟定整风为今后工作的四大任务之一。<sup>⑦</sup>

尽管有延安和分局的再三命令,但整风在山东不少地区仍未迅速开展起来,“有的地方至今还根本未进行学习,有的地方学习陷于停顿,好些区党委、军区一级干部都未认真学习”。因此1943年6月1日,山东分局再次发出指示规定不分上下,不分新老干部,全体进行整风学习,将学风、文风联系学习,预计时间为1年,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第二阶段均学习学风、文风,第三阶段始学习党风”,其中第一阶段学习文风,发扬民主,第二阶段精学文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党风中宗派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的纷争,以及因这些不正确的观点而产生的不团结、官僚主义、小广播等”。<sup>⑧</sup>6月22日,分局又对指示如何执行做出说明:利用青纱帐起的有利时机,除营、县两级以下至少仍每日两小时学习外,团及党政民地委以上干部一律实行半日学习制,每日至少4小时;强化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各区由区委书记记绝对负责领导,“以身作则,从直接领导各主要机关做起,坚决贯彻实行”。<sup>⑨</sup>自此,整风开始以一场运动的规模开始在山东进

① 《总结学风学习 开始党风学习》,《大众日报》,1942年11月5日,第1版。

② 《朱瑞、陈光、罗荣桓关于山东情形给刘少奇并党中央的报告》(194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502页。

③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页。

④ 武清忠:《严峻的时刻》,临沂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忆沂蒙》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8—29页。

⑥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1943年4月18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1942.9—1943.7),第444页。

⑦ 朱瑞:《忆北方局和山东分局》,《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下册,第781页。

⑧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整风学习中存在问题的指示》(1943年6月1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G001/01/0073/004。

⑨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整风问题的紧急指示》(1943年6月2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G001/01/0073/005。

行下去。

山东部队的整风学习,开始是团以上党员干部、机关干部参加,战斗部队少数营的干部参加,后来逐步扩大到营和连的干部,以在职为主,同时也重视进学校短期轮训。先整顿学风、文风,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要加强对照学习;接着整顿党风,号召干部之间互相学习,特别是促进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之间的团结,最后学习延安下发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对少数文化程度低、阅读文件难的干部,采用上课、组织互助和集体阅读等方法加以辅助。<sup>①</sup> 山东军区也规定此类人员,以一半时间进行整风学习,一半时间进行文化学习。<sup>②</sup> 据孙汉卿回忆,整风学习的一般方式先是学习 22 篇整风文件,甚至一些人通读精读了多遍,几乎都能背下来。学习后,就对照文件,联系个人的历史和思想实际,进行自我检查,特别是反省自身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私自利、风头主义、小资产阶级情调和自己做的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最后在整风小组会上作检查,进行自我批评,由大家互相提意见,提高思想认识。<sup>③</sup>

根据景晓村对山东的整风学习的观察:1942 年“七一”之前是第一阶段,部分的做到整风学习,“如对上级指示的研究,毛泽东同志报告的讨论传达,某些单位工作检查,和部分干部的思想反省”,但仍远远不够,主要问题包括:对整风运动的认识不正确,没有认识到整顿“三风”的重要性,不少干部夸夸其谈,“什么主观主义、党八股、宗派主义,顺嘴一谈,随便联系”;在领导方面,也不能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整风学习;对文件的学习态度也不好,“一般同志多是走马观花”;要求过高,“不了解文件精神,即急于检查工作”。7 月以后开始了第二阶段,纠正了上一阶段存在的粗枝大叶、急求速成等缺点,重新整理学委会,成立整风实施委员会,以加强领导,将过去政治、理论、文化、业务四种学习暂停,重新制定计划来集中精力学习 22 篇整风文件。<sup>④</sup> 但是,因为在整风学习中过度强调要整顿“三风”,结果在部队中,有人因反对教条主义而不敢看理论书籍,怕犯主观主义不敢发表意见,怕犯党八股而不敢写文章或作长的系统发言<sup>⑤</sup>,展现了整风与学习之间的内在矛盾。总的来说,从 1942 年 4 月到 1943 年上半年,山东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整风文件,进行得较为和缓。

## 二、审干：整风运动的发展

1943 年 1 月,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敌后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且须“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sup>⑥</sup> 将学习与审干并重,标志着华北整风运动开始突出审查干部的重要性。原本中共组织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审查和鉴定党员,由于干部绝大多数就是党员,且中共一向重视干部问题,因此,审查干部成为中共组织问题的重中之重。随着抗战初期中共队伍的快速发展,1939 年 10 月延安提出:“要有系统的考查干部和党员,坚决的同时是慎重的

① 华楠:《山东纵队的整风运动》,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中册,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0 页。

② 《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直属系统整风学习计划》(1943 年 6 月 23 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9 辑(1942.9—1943.7),第 513 页。

③ 孙汉卿:《回忆罗政委领导整风片断》,中共临沂市委、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三帅在沂蒙》,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4—175 页。

④ 《关于整风学习的报告》(1942 年 11 月 10 日),《景晓村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 页。

⑤ 《山纵一年来整风运动总结报告》(1943 年 3 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军史档案,3060607/03203。

⑥ 《毛泽东关于敌后形势和当前的中心任务致彭德怀电》(1943 年 1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组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94—895 页。

个别隔开的清洗敌探奸细托匪叛徒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sup>①</sup>,1940年8月,进一步强调“对于干部的审查、考察与教育,成为巩固我党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工作”。<sup>②</sup>审查干部虽然是中共一项经常性组织工作,但随着整风运动开展起来,毛泽东开始将整风与审干结合起来。1942年4月运动开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从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sup>③</sup>所以,整风运动一开始就包含了学习与审干两个方面,以运动的方式进行审干。

在毛泽东看来,整风与审干是一体两面,都是为了纯化中共的组织。但整风开始之初,除了延安个别单位,中共各地多集中于学习整风文件,审干还是延续了1939年秋以来“巩固党”及审查鉴定干部工作,未成为一项运动。1943年4月3日,延安提出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明确将整风与审干联系起来,“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详细说明了在整风运动中如何进行审干、反奸。<sup>④</sup>为响应延安的号召,八路军政治部于5月也提出把审干与整风学习密切结合起来,“有计划有组织的审阅研究”干部的“反省自传、历史思想自传和反省笔记”,既可“得出对干部培养教育的经验和理论,并且也可能暴露和发现个别品质坏的和个别隐藏的奸细”。<sup>⑤</sup>虽然有延安与太行的命令,但在不少根据地,整风学习本来就开始得晚,一时无法将重点转移到审干方面,为此,北方局不得不再次强调“不一定要在整风完结后才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sup>⑥</sup>,号召把整风、审干合二为一。

山东的整风运动实际上也是1943年才真正开展起来。4月18日,山东分局号召重振整风,但重点仍是学习,虽提出整风学习笔记“按级审查制度(分局审阅区党委,师审阅旅,军区审阅各军分区)”<sup>⑦</sup>,但还没有上升到审干的高度。直到1943年9月,山东分局提出“整风为主期间,准备审干”,认为山东党内存在大量内奸,此外,在山东抗协、各级参议会中以及随国军李仙洲入鲁而进入中共根据地的人员中均有特务,加之外省奸细特务有组织混入等造成山东根据地内存在大量奸细。分局提出以整风为主,采取调查布置,从侧面准备审干,包括:分局区委的组织与锄奸部门合组,协助党委进行干部调查;组织部门在年底之前完成县营以上干部履历登记,对可能有问题者进行精细的侧面调查;锄奸部门年底内重新研究过去的结论;重新改订各级主要干部的配备以确立自己的阵地,计划自1944年开始审查干部,在该年年底或1945年春完成,并将发现有嫌疑的干部送往分局或者延安。<sup>⑧</sup>

但山东分局的这一计划还是从传统的审干、锄奸经验出发,侧重从组织角度进行,而不太符合毛泽东将整风与审干、思想与组织结合起来的构想。关于如何在整风中进行审干,1943年的“四·三决定”已有明确的说明:“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

① 《中央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1939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39—194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② 《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39—1940),第44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1—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年),第29—33页。

⑤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审查与鉴定干部的指示》(1943年5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抗日战争时期”(4),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⑥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的指示》(1943年12月24日),《八路军·文献》,第963页。

⑦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1943年4月18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1942.9—1943.7),第445页。

⑧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在整风为主期间准备审干步骤向中央并北局的报告》(1943年9月),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G001/01/0073/008。

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这样“正确意见会生长表露,另方面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说怪话、反领导、甚至反党等各种不正确的现象,也会发生。而这两方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在“第二阶段中,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强调四三决定上要求注重领导一方面,着重发扬正确意见,缩小民主范围,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第三阶段“将是反省自己、批评别人开展最热烈的阶段”,“主要地应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以便弄清各同志的面目,了解其缺点与纠正其缺点。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误分子(党员),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sup>①</sup>因此,毛泽东自然对山东的审干计划有所不满,为帮助山东进行整风审干,还将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情况发给山东作为参考。<sup>②</sup>

为此,黎玉提出山东党要完成两件事,“即审查干部,清除内奸。过去的缺点是只有组织上的,没有思想上的,所以今后要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sup>③</sup>罗荣桓也认为“整风,就是要转变异党作风,使大家在审查干部中变成一条心。审查干部的着眼点:从立场中去认识,尤其从长期实践行动中去认识,并经常从实践中去审查、纠正及修正结论。要抓住每个干部的不同特点、其思想意识转变的规律,逐渐达到比较完满正确地认识每一个干部”。<sup>④</sup>之前,山东规定每3个月进行一次审干,但特别强调:“不能认为都是坏分子一律洗刷,以至形成清党运动,造成党内的恐慌,是不好的。”<sup>⑤</sup>为避免党内出现恐慌,山东分局又强调不能公开传达审干,而是在整风中“掌握审查干部这个重要环节。如果有人提出反省就是审查干部,就要分别解释清楚,使他真正了解审查的意义,以免产出误会”。<sup>⑥</sup>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一开始就“怀疑是包含审干的作用”,罗荣桓对此并未否认,只是含糊表示:“如果把民主检查改进领导的目的当作为审干或者单纯强调审干,则是不对的。”<sup>⑦</sup>

因此可以说,中共在整风中大力进行审干。1943年8月15日,延安通知各根据地注意审查干部,“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sup>⑧</sup>明确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审干,也将毛泽东提出的“审干九条”方针,明确传达到包括山东在内的各根据地。罗荣桓趁机在山东提出:展开学习整风对锄奸工作尤为重要,“中央指出,我们过去这一工作犯了一套主观主义的做法。就是用审讯犯人,让犯人乱供口供,我们工作者听信口供,然后胡来一顿,就是逼、供、信三个字,作为我们这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造成了严重的错误”,“只有展开学习整风,我们思想上有了改造,才会有兵精、武器好,

①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年),第30—32页。

② 《中共山东分局转发党校第三部(中央研究院)整风情况汇报》(1943年12月14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G001/01/0073/003。

③ 《日记摘录》(1943年9月26日),《谢有法将军文辑》,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④ 《日记摘录》(1943年9月8日),《谢有法将军文辑》,第205页。

⑤ 《山东分局对今后工作的决定》(1939年10月10日),济南市档案馆、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1937.7—1945.8),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⑥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迅速汇报整风审干工作情况及经验的通知》(1944年6月17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G001/01/0090/011。

⑦ 《关于民主检查的几个问题》(1945年3月),《罗荣桓军事文选》,第339—340页。

⑧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年),第89页。



打击敌人的特务时,才能很妥善的解决问题”。<sup>①</sup>

1943年10月9日,为贯彻延安及北方局审查干部的指示,罗荣桓主持山东分局,决定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sup>②</sup> 山东的干部被分为六类:地方党干部、延安抗大派来的、平津流亡学生、五战区来的、国民党及统战关系介绍来的、抗战中培养提拔起来的。其中“个别坏分子转变方式潜伏在党内,进行隐蔽活动”,因此“审查党——首先审查干部,进一步的巩固党,仍为目前急务”。此次整风“不仅清除奸细,尤在打通干部思想。故必须与整风相结合,强调审查思想、改造思想,在干部的自觉基础上具体指导他们写反省自传,组织坦白运动;党委及组织部门即参加学委会领导整风,以学委会面目出现,看笔记,参加讨论会,研究干部思想发展,发现坏分子,并可发动个别坏分子坦白揭发和个别模范干部反省,来迅速掀起整风热潮”。<sup>③</sup> 这一指示明确提出山东要从整风中审查干部,整风为审干提供了基础:既包括思想上的基础,也包括方式方法上的基础。特别是整风运动大力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进行个人反省,并逐步发展到全面向党坦白。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的三大作风之一。谭政曾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废。但是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达自我批评的目的”<sup>④</sup>,通过自我批评,来揭露问题,使党可以更多地掌握干部情况。据曾在——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李毅回忆,他在整风审干中先学习整风文件,然后总结自身在地方党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解剖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深刻地检查了其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萧华、赖可可等上级领导亲自参加整风学习小组会,听取了李毅的思想检查发言,并当场指出其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今后的努力方向。<sup>⑤</sup> 此外,每个干部除了进行口头的自我批评外,一般干部还要结合整风材料,进行自我反省,撰写反省笔记。因此,山东分局要求各级党委要将反省材料(包括反省书、履历书、坦白材料,个人卡片)等加以整理与统计作为审干的重要依据。<sup>⑥</sup> 不过,反省笔记也存在不少问题:知识分子干部“文化水平高的,笔记都写得空洞,议论多,反省少”;工农干部虽一提笔就反省实际,但“不能在认识上展开”;一般文化程度干部则“议论不像议论,反省不像反省”。<sup>⑦</sup>

因此,随着整风运动日趋激烈,反省逐步升级到了坦白运动。1943年8月21日至10月初,山东军区组织召开了军区机要工作会议,大力开展了整风、写自传,开始发动坦白。<sup>⑧</sup> 反省与坦白虽然一脉相承,但反省更多地侧重思想层面,结合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自我批评,而坦白则是无条件地向党坦白一切。与反省相比,坦白运动在推行中阻力更大。根据滨海军区的报告,在坦白运动中,一般存在如下阻碍:一些负责的领导干部顾及面子或者担心降低威信而不愿暴露自身弱点;一些平时犯过错误的干部担心坦白后被撤职,或担心即使不撤职也会影响将来提拔;一些来源的干部,特别是参加过其他党派的干部更不敢坦白,害怕开除党籍;一些两条心的干部,一部分是不肯坦白,总想为反动阶级服务,一部分虽想改过自新,但怕党对他不宽容;女同志不愿坦白,担心一反省

① 《锄奸工作的几个问题》(1943年8月),《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05页。

②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页。

③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1943年10月9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东党的革命历史文献选编(1920—1949)》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5—368页。

④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1944年4月11日),军事科学院《谭政军事文选》编辑组编:《谭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⑤ 李毅:《深切怀念老领导肖华同志》,《回忆肖华》编辑组编:《回忆肖华》,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

⑥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帮助大众日报整风审干经验通报(草稿)》(1944年3月23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90/005。

⑦ 《山东分局党校第四期整风学习经验介绍》(约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98/003。

⑧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347页。

就扯上男女关系问题;一般干部大多参加了坦白,但多容易揭露思想不正确方面,例如英雄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等,但暴露具体错误则很少。<sup>①</sup> 因此,山东党认为“没有坦白运动,反省常走到应付与欺骗”,加紧推动进行。<sup>②</sup> 鲁中、滨海首先坦白出了一些特务分子及政治动摇、贪污腐化等情况,开启了山东的坦白运动。<sup>③</sup>

进行坦白运动,领导首先要发挥带头作用,并掌握运动的主动权。据高克亭回忆,为了结合整风进行审干,罗荣桓决定干部分期分批到分局、区委党校学习,结合自己的实际写出反省自传,进行集中整风审干。<sup>④</sup> 审干进入坦白阶段后,领导要首先进行检讨,以引导一般干部发言。例如在鲁中,就由司令员兼政委的罗舜初首先进行自我批评,霍士廉、高克亭、王麓水等一批高级干部带头写学习笔记,有的还拿出来互相交流,征求意见,进行反省检查。<sup>⑤</sup> 运动开始时,领导干部要做好调研工作,对本单位有明确的了解,既要有领导也要有民主,还要发现积极分子,由于“积极分子多是社会经验缺乏,政治水平不高”,因此领导要着重对其进行培养,使之逐步提高,有些问题由领导迂回提出,有些由积极分子去提。发现有问题的,由领导干部多讲话,“一定把他讲通,使他自责起来,给以感动力以后,即可以使他们自己讲”,领导要“了解他的内心思想斗争情况,使之内力与外力同时并进,推动他进步”。<sup>⑥</sup> 由此打开运动的突破口。

根据山东分局党校的经验:发动坦白,首先“支部进行了很多工作”,包括“重新编制座谈组”,“指定专人帮助工农干部等”,但在运动“还没有普遍的开展”的情况下,某个人的坦白就成为关键,由其在大会上主动揭发自己“保存着两条心的错误思想”。组织者趁机在会上再次动员坦白,会后由各小组“联系自己,进行座谈讨论”。<sup>⑦</sup> 在个别坦白后,“再开展部门座谈,以自己斗别人,从思想斗工作”,对于已经坦白的要“着重引导其彻底暴露”,对坚持不坦白的要“先攻最弱,对其他转表冷淡,甚至利用他们相互推动,基本上利用会议反省形式,以集体力量推动坦白,配合个人谈话适当鼓励批评”。<sup>⑧</sup> 总体上讲,中共主要靠树立典型和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推动坦白。但由于不少中共干部政治、文化素质不高,这种集体的压力往往容易出现問題。时任渤海区组织部部长的孙汉卿回忆:在区党委整风班上,“追查一个所谓‘思想意识不健康’的同志的历史,说什么‘存在决定意识’。他现在有这种意识,必然在历史上存在问题,必须坦白交代。于是,轮番围攻追逼,弄得同志们神魂不安”。<sup>⑨</sup>

总的来说,山东分局要求整风审干“是在干部自觉基础上,帮助组织了解干部,在政策上是宽大的”。<sup>⑩</sup> 这既是罗荣桓等在政策上与延安等地相比,把握较为宽松,同时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① 《整风学习中注意几个问题》(1944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0003/01/0002/5。

②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帮助大众日报整风审干经验通报(草稿)》(1944年3月23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90/005。

③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要求各地汇报整风情况的通知》(1943年9月8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73/007。

④ 高克亭:《忆罗荣桓实事求是作风的几件事》,《三帅在沂蒙》,第107页。

⑤ 华楠:《山东纵队的整风运动》,《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中册,第251页。

⑥ 《目前整风反省中的几个问题——七月十五日分局军直各学分会联席会上舒同同志发言》(1944年7月15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73/006。

⑦ 《山东分局党校第四期整风学习经验介绍》(约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98/003。

⑧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帮助大众日报整风审干经验通报(草稿)》(1944年3月23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90/005。

⑨ 孙汉卿:《回忆罗政委领导整风片断》,《三帅在沂蒙》,第175页。

⑩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帮助大众日报整风审干经验通报(草稿)》(1944年3月23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90/005。

为动员主动坦白,领导多“保证任何同志只要把错误反省出来,组织上绝不会给予任何处分”。因此,许多干部感到:“这样严重的错误都反省了,自己还有什么不可以反省的”,特别是看到组织上对其宽大处理,“不少同志才大胆揭发了长期隐瞒在自己内心的问题”。<sup>①</sup>在鲁中,一个县委组织部部长,坦白曾参加过“三青团”,对此,中共不仅未作任何处理,反而要其大会发言,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sup>②</sup>不过,对树立的典型如果掌握不好,也会出现问题。例如在滨海区召开的整风坦白大会上“公开号召‘坦白无罪’”。于是,有个人在大会上坦白自己当特务,如何来根据地的,又与谁一起当特务(事实是乘机陷害好干部、好同志)。坦白后,当然得到了宽大处理。后来这个家伙跑到敌人那里去了”,正面典型又成了反面教训。<sup>③</sup>

### 三、民主检查:整风运动的高潮

1944年初,山东分局总结了推动坦白的方法:“基本上采取宣传教育,使其了解党的宽大政策,对较顽固的分子应采取耐心规劝、谈话,兼用一打一拉,群众压力,证据等,但不应该说刺激话。一旦坦白后,应在情感上表示同情,欢迎其回头。不过宽大与镇压必须结合(虽不是用刑或逼供),防止自杀。”<sup>④</sup>因此某种程度上讲,坦白运动既通过发扬民主、宽大处理来引导,也发挥集体的力量来着力。根据10月份山东分局向延安的报告:分局及军区直属各机关参加大小坦白会的约2000人,胶东区直属机关四次坦白大会1100余人,胶东北海、东海军分区、地委的约500余人,鲁中区党委、军区1000人,渤海区党委几个地委约170人,滨海、鲁南正进行中,总计约有5000人进行反省坦白,其他专署以上的政权、工商局及省政委会与滨海约有500人,基本上执行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的基本路线”,特务一个没杀,“逼供信”的错误一般未犯,临时捕押与限制自由的有不到10人。<sup>⑤</sup>

且随着运动的开展,坦白已逐步突破审查干部的范围,扩展到全体战士。除了考察平时表现,部队甚至要求战士坦白自13岁至入伍前的历史。<sup>⑥</sup>例如滨海军区六团二营,首先在营军人大会上进行坦白动员,“提倡真坦白,反对假坦白”,各连在党课时间组织坦白,每晚点名时进行总结,平常休息时进行个别谈话布置动员。以连单位组织开会,营连干部进行分工,分别负责掌握会议方向、记录、鼓动,特别是发动老战士充当积极分子,带动全体战士进行发言。<sup>⑦</sup>反省坦白出的问题多是曾经参加过土匪,思想开小车,有逃跑的想法等。经过运动,一连坦白出有问题的102人,二连坦白了18人,三连坦白了76人,四连坦白了67人,甚至运输队也坦白了47人,其中伙夫4人,战士43人。<sup>⑧</sup>当时,中共一个营约在500至1000人不等,可见坦白比例之高。不过,通过在士兵中进行坦白运动,客观上起到了巩固部队的效果。

① 《山东分局党校第四期整风学习经验介绍》(约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98/003。

② 崔子厚、陈岱:《忆往事寄哀思》,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深切怀念高克亭同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③ 孙汉卿:《回忆罗政委领导整风片断》,《三帅在沂蒙》,第175页。

④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本局与军区直属队整风审干的初步总结》(1944年3月1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90/002。

⑤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今后指示》(1944年10月13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1944.9—12),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80页。

⑥ 滨海二地委:《1944年三个月锄奸工作指示》(1944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0005/01/0002/1。

⑦ 《二营战士坦白反省总结报告》(1944年4月20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0009/01/0005/7。

⑧ 滨海独六团:《一九四四年锄奸总结报告》(1945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0009/01/0005/1。

在延安,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的反特斗争动员大会上作了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在审干中“清除内奸”,“说什么‘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必须对他们进行抢救。同时,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下,号召‘失足者’坦白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sup>①</sup>8月15日,延安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强调:“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sup>②</sup>自此,延安的整风审干由坦白运动发展到抢救运动。1943年秋,康生的《抢救失足者》从延安传到了山东,抢救运动的做法也传到了一些单位。罗荣桓看过后,通知“不要向下分发”。<sup>③</sup>一般论述多据此认为山东在罗荣桓的领导下没有进行抢救运动。<sup>④</sup>抢救运动是坦白运动的发展,可视为整风审干的高级阶段。不过,当时在整风运动中,延安与山东存在时间差,当延安开始抢救时,山东才刚刚开始审干,坦白还未进行,又何来抢救。

坦白运动至少在理论上还建立在干部思想自觉的基础上,包含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的意味。但在抢救运动中,已大量出现“逼供信”和开群众大会的现象。罗荣桓确实在整风审干中,多次强调要反对使用“逼供信”,甚至多次要求各地区汇报是否坚持了毛泽东提出的审干九条方针,有无“逼供信”的倾向。<sup>⑤</sup>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在1944年,胶东等地区及一些单位还是出现了“在审查干部当中抓特务搞逼供信”。<sup>⑥</sup>胶东区党校甚至搞“疲劳战术”。<sup>⑦</sup>罗荣桓知道后指示:“整风不能没有领导,不能搞逼供信”,要求胶东区迅速停止错误的做法,把搞的那些材料全都烧掉,干部还照样使用。<sup>⑧</sup>至于召开群众大会的形式,前文的材料也已指出在军队及滨海等地区也同样进行了。因此,认为山东没有进行抢救运动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只是跟延安及其他大部分根据地相比,山东的抢救运动时间较短,在规模上和激烈程度上较小。康生所总结的“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运动’”<sup>⑨</sup>,仍是中共整风运动的一般规律。

山东的渤海军区由原一一五师建立的冀鲁边军区与原山东纵队建立的清河军区合并而成,因邢仁甫事件,领导多由原清河军区的负责人构成。在1944年的整风中,一些干部就提出“清河区有宗派”,在会议中这种情绪多有表露。军区政委景晓村只能无奈地表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注意多作团结工作就是,人家说什么就说吧。”<sup>⑩</sup>从此例可以看出,整风会在一定程度影响山东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统一领导局面,加剧原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干部之间不团结的情况。何况山东在肃反问题上已发生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例如“湖西肃托”“泰山肃托”等。这些都是罗荣桓在领导山东整风审干中不得不慎重的重要因素。<sup>⑪</sup>山东与延安存在时间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山东的坦白运动逐步向抢救运动转化时,延安已开始纠正前一阶段的错误,由抢救转为甄别。山东未大规

① 《伍洪祥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年),第89页。

③ 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④ 周绍华:《罗荣桓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泰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62页。

⑤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要求各地汇报整风情况的通知》(1943年9月8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73/007。

⑥ 李新阶:《驰骋齐鲁汗洒松辽——忆罗荣桓同志》,杨复沛、李庚奇主编:《光荣艰巨的历程——机要人员工作生活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⑦ 李维民、潘天嘉编著:《罗荣桓在山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页。

⑧ 《罗荣桓传》编写组:《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⑨ 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⑩ 李震:《忆景政委晓村同志》,《景晓村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景晓村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⑪ 《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588页。

模开展抢救反倒成为模范。在1944年5月,延安发往各根据地纠“左”的指示中对山东进行了表扬:“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经验。”<sup>①</sup>

1944年8月,罗荣桓向毛泽东报告:经过整风,在山东政委会、参议会等机关“暴露不少,但未发现内奸问题”。<sup>②</sup>不过,延安从山东来的干部中已发现不少特务嫌疑,一些山东的地方党组织被揭发为“红旗党”,并将相关情报转交山东分局。<sup>③</sup>且根据山东之前的报告,延安已对其情况有所掌握:至1944年上半年,已参加整风的450名干部中,发现日特5名,国特4名,嫌疑分子8名,托派2名,国民党13名,其他党派12名,道会53名,贪污134名,隐瞒党的84名,不道德的28名,动摇的6名,隐瞒学历的5名,隐瞒成分的9名等。<sup>④</sup>相较其他根据地,坦白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山东整风审干较为宽松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担忧。1944年春,延安派军委整风审干领导小组副主任舒同到晋冀鲁豫边区及山东分局传达延安整风和高干会议的精神,推动民主检查。<sup>⑤</sup>舒同于1944年秋到达山东。<sup>⑥</sup>趁此机会,延安决定再次改组山东分局,舒同参加分局为委员兼秘书长。<sup>⑦</sup>9月6日,罗荣桓同意了延安的决定,并表示:“舒同同志来此,对我们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有极大帮助。”<sup>⑧</sup>自此,在朱瑞、陈光1943年回延安后,山东由罗荣桓、黎玉、萧华、舒同重新组成了四人领导核心。<sup>⑨</sup>舒同兼任分局整风领导小组组长<sup>⑩</sup>,山东的整风运动自此由其具体负责。

1944年10月8日,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批评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暗指之前山东存在“右倾”的问题,“目前干部思想上的主要倾向是立场不稳,右倾情绪及不安心工作等。目前各地学习文件一般不够认真,反省起来有的套反省选集,有的光说一套后,后面终不能解决”,要求“已开过坦白运动地区勿自满”,暴露不等于解决问题,应趁热打铁深入贯彻,凡是整风较深入的地区均已开始发现日特、国特打入中共进行破坏活动。<sup>⑪</sup>此指示主要反映了舒同的看法,即山东没有发现,或发现特务较少是整风不深入造成的,“实际上不指名批评了罗荣桓曾提出过的观点”。<sup>⑫</sup>10月13日,在舒同的指示下,山东分局再次致电延安及胶东、渤海等区,除了继续检讨山东之前的整风外,提出山东“当前整风完全进入审干与防奸阶段,所以整风反省坦白不但是思想上、政治上审查干部,而且亦是组织上审查干部”,根据地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整风审干为主,审干决不能离开整风,只有启发教育干部暴露问题,才能正确地完成审干任务。<sup>⑬</sup>值得注意的是,该指示提出以“发扬民主,检查领

① 《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7册,出版信息不详,第390页。

② 《答复毛泽东主席向各战略区电询的十个问题》(1944年8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42页。

③ 《朱和春同志发言》,《山东党史资料增刊 在京山东老干部党史座谈会专辑》,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79页。

④ 《中央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1944年5月13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7册,第390页。

⑤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6页。

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撰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38卷,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243页。

⑦ 王建华、谢一彪:《舒同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页。

⑧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379—382页。

⑨ 《罗荣桓口述、自传》编写组:《罗荣桓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

⑩ 《王若望自传》第2卷,香港,明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⑪ 《中共山东分局整风审干工作指示》(1944年10月8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G001/01/0090/014。

⑫ 《罗荣桓口述、自传》,第295页。

⑬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今后指示》(1944年10月13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1944.9—12),第83—84页。

导”即民主检查的方式，“采取‘暴露’的方针，鼓励大搞民主，达到审干的目的”。<sup>①</sup>

实际上这一方法是中共 1943 年“四·三决定”的重要内容，以民主的名义，让干部暴露，以此来审查干部与发现特务。山东在坦白运动中也曾借鉴过这一模式。1944 年 6 月，山东分局就指示要“尽量发扬民主，诱导其自责反省，并从侧面搜集材料”，“对疑似特务分子，表面表示麻木大意，以便其尽情暴露，并从各方面收集证据后，再追清楚”。<sup>②</sup> 具体说来要有“掌握的而不是盲目的采取民主的方法”，在一个整风学习小组重点通过民主方法启蒙起来，由几个人带头，把有问题的也带出来，促使他们暴露。<sup>③</sup> 但这一方式，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高克亭就指出：“民主检查，是为了上下团结，而不是上下分裂”，但出现了对领导采取污辱、谩骂等现象，“发展小资产阶级自由思想，说极端民主总比官僚主义好”，批评意见“不是对事而是对人，对领导痛恨，看见领导就一肚子气，认为与领导同志接触是可耻的，领导同志一举一动都要民主决定”。<sup>④</sup> 结果，民主检查在山东整风中一度受到了限制约束，未发展成一场运动。

但是，随着舒同入鲁并主持山东整风，民主检查再次被大力提倡起来，整风运动“很快出现了高潮，突出的是发扬民主，检查领导。此外，也进行了审干、除奸”。<sup>⑤</sup> 特别是 1944 年 11 月 1 日，山东分局发出整风审干补充指示，宣布整风运动已发展到“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阶段，批评某些领导干部“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的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干部大都是经过残酷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要求继续贯彻暴露方针，“先用民主精神实行检查工作，生活、领导各方面”，“使干部敢于发言提意见。接着讨论时事政策问题，然后于适当时机转入几个整风文件学习”，最后进入全面反省坦白运动。<sup>⑥</sup> 尽管罗荣桓对此指示持保留态度<sup>⑦</sup>，但舒同积极推动民主检查运动，号召“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提出“怕影响群众发言，主要领导干部要回避”，“一个人发言是一个侧面，集中起来就是全面”。最终，民主检查运动在山东分局、军区的几个单位，如《大众日报》社、军区卫生部、战工会（即省政府）直属机关及鲁中、胶东等军区党委机关进行试点推广。<sup>⑧</sup>

山东军区卫生部，为执行暴露的方针连开了 7 天民主大会。会上对领导干部提了不少意见，但没有发现比较严重的特务言论。部政委谷广善向分局汇报了情况，建议结束民主检查。但是，舒同认为：“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找特务”，要谷广善回去继续动员发扬民主，“说打也可以，骂也可以”。<sup>⑨</sup> 民主检查运动既然不能收，就只能继续下去，果然有的干部对此表达了不满，说什么：“宁愿在敌人那里住一年监狱，也不当一天八路军！”于是，舒同便对谷广善说：“你看，我说你们那里有特务吧！”谷广善只能抱怨说：“那叫什么特务？还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逼着他信口胡

① 《罗荣桓口述、自传》，第 295 页。

②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迅速汇报整风审干工作情况及经验的通知》（1944 年 6 月 17 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90/011。

③ 《目前整风反省中的几个问题——七月十五日分局军直各学分会联席会上舒同同志发言》（1944 年 7 月 15 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073/006。

④ 《正确认识民主检查的收获与缺点，继续深入开展反省与自我批评——在鲁中区党委机关民主检查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1944 年 6 月），《高克亭文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1998 年编印，第 2 页。

⑤ 陈冰：《怀念舒同》，王云飞编：《舒同书法集》，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97 页。

⑥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1944 年 11 月 1 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3 辑（1944.9—12），第 172、174 页。

⑦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 379—382 页。

⑧ 《象罗帅那样对革命对同志》，陈沂：《五十年一瞬间》，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23 页。

⑨ 李维民、潘天嘉编著：《罗荣桓在山东》，第 316 页。

咄。”<sup>①</sup>就在此时,日军展开冬季“扫荡”,一度离卫生部驻地只有几十里远。罗荣桓趁此时机指示卫生部脱离分局机关单独行动,“民主会开得这么乱,领导上可得注意一点”。谷广善回去之后宣布民主运动暂时停止,把墙报、漫画卷起来,等“扫荡”完了后再继续进行。结果,在反“扫荡”中,那些有嫌疑的干部都经受住了考验,民主检查也没有再恢复。<sup>②</sup>

1943年6月,延安就专门指示山东要注意知识分子,“抗战后打入我党的内奸,大部分是知识青年”,很多不易查出,因此“须要首先从深入整风的思想斗争入手,进而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再进而清查干部的历史与思想,号召对党坦白。再进而调查可疑分子材料”。<sup>③</sup>果然在山东民主检查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分子以知识分子干部为主,又印证了中共的判断。例如《大众日报》社,知识分子干部较多,运动也较为激烈。据时任报社社长的陈沂回忆:报社有些职工,要求每人除一件棉袄外,再发一件长袍,并且要挟领导非发不可。陈沂解释说,财政上有困难,一时办不到,并引用战工会(省政府)的规定,指出这是与政府规定的制度不相符。但有些人竟扬言:“共产国际都可解散,战工会的规定算个什么”,个别人甚至威吓说:“非发长袍不可,不发,小心你的机器。”这场风波最后经过说服,才平息下去。<sup>④</sup>不过陈沂个人还是受到了冲击,由于他喜欢骑马,喜欢吃辣椒,都被视为特殊化,结果马尾巴被割了,炒辣椒的锅也被砸了。<sup>⑤</sup>

在地方上,民主检查运动往往将主要矛头对准了各区负责人,鲁中区尤为明显。在军区民主座谈会上,一个参谋甚至表示想用手榴弹把军区领导王建安、罗舜初炸死。<sup>⑥</sup>鲁中区党委响应分局号召,采用大民主方式,发动群众提意见,所有工作人员,包括伙夫、马夫都参加。由“主席团”领导民主检查运动,区党委交了权,负责人均不参加“主席团”。其中,军区政治部又是民主检查的试点,原山东纵队宣传大队的人员多充任“主席团”的成员。民主检查开始后,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完全失去了领导权,有人不仅在会上辱骂,还张贴了许多大字报,画了漫画,说周赤萍是政治部的恶霸,甚至连周的警卫员也不跟他。周赤萍向区委书记高克亭抱怨:“这是什么整风学习,明明是整人嘛!他们除了没说是汉奸外,什么都说了。”其实此时高克亭也处境困难,区党委机关也被夺了权,领导人每天要到民主会上听取批评意见,且不得擅自离开,会上还有人故意刁难,“听意见作记录不行,他说你不认真听,但不作记录也不行,他说你不想记住批评,以后无法改正”。<sup>⑦</sup>

#### 四、整风运动的结束

这种批评围攻领导的氛围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舒同主持下的山东分局的鼓励。1944年11月,山东组织300多名干部进入党校第6期学习,这是抗战时期山东党校规模最大的一期。在初步整顿组织与安定学习情绪之后,党校“即开始着手审查干部工作”,“首先置着重点于发挥民主,检查领导(主要是检查原来工作岗位上的领导),进而讨论目前的时事政策问题”,以达到暴露为目的,

① 《罗荣桓口述、自传》,第297页。

② 《罗荣桓传》,第216—217页。

③ 《关于清查山东内奸分子的指示》(1943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页。

④ 《象罗帅那样对革命对同志》,陈沂:《五十年一瞬间》,第523页。

⑤ 《罗荣桓传》,第216页。

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审委员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写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29卷,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⑦ 高克亭:《我的革命生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2页。

“在暴露到一定程度时，即回到研究几个有关反省的文件，深入宽大政策的解释、教育，正式组织反省，号召坦白，以完成审干要求”。<sup>①</sup> 由于大力提倡“发挥民主，检查领导”，不少地方“以为与领导越对立越凶就越好，以为接近领导便是耻辱。便是溜沟子、克里空、狗腿子、奴才思想、上层路线，甚至在有些单位中总工要挟领导，产生反领导反党的现象和倾向，批评领导变成斗恶霸、斗地主、开公审会，侮辱、谩骂、讽刺、打击领导者，把领导都看成是‘戈尔洛夫’‘老油条’，甚至不惜采取敌对态度，把民主会看成是‘翻身’‘晴天’‘抬头’”。<sup>②</sup>

在山东分局办公厅，“有些干部在大会发言、墙报、漫画中，讽刺、谩骂、挖苦领导干部，打击‘接近领导’的积极分子，而他们自己则以‘大交谈’为名，自由结合，组成小圈圈，甚至提出按‘三三制’要求改组支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对领导有意见的被称为‘积极分子’的人各占三分之一），把领导与被领导看作‘成分’上的不同，提出‘干事是基本群众’，‘群众应掌握支部脉搏’等”<sup>③</sup>，直接冲击了山东分局的领导。事后，萧华特别批评了少数同志不尊重甚至侮辱领导，“有个别的则专钻空子，挑拨、煽惑被领导者与领导者对立，造成互相猜疑、混乱、对抗，甚至发展到反党倾向”。<sup>④</sup> 这里的“少数同志”主要指的就是王若望。王若望 1933 年就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1937 年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并加入中共，属于延安知识青年一代，曾参与《轻骑队》民主墙报的创建。1942 年初被调往新成立的城市工作部受训，《轻骑队》出问题后，他因已调出受训而幸免于难，受训结束后被派往山东工作。<sup>⑤</sup>

1942 年秋，王若望到山东后，跟随分局巡视团参与处理胶东肃托。胶东根据地是由山东纵队建立的，长期受黎玉的领导，其下级林浩是直接负责人。据巡视团调查，肃托杀掉的 13 人中，只有 4 人是奸细，被捕的 457 人中，只有 21 人是奸细。<sup>⑥</sup> 胶东肃托的发生与黎玉的推动密不可分，遂引起了王若望对黎的不满。在分局召开的民主座谈会上，王若望批评黎玉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保守偏颇，反而把工作成绩吹得天花乱坠；上层领导的专制独裁与架子十足，助长了下层干部唯唯诺诺的奴性。王的发言引发了不少干部的共鸣。加之他是从延安来的，曾在《大众日报》上发表过毛泽东的小故事，许多人认为王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的发言代表了毛的意思，于是纷纷称赞和支持王若望。<sup>⑦</sup> 另外，王若望采取延安民主墙报的经验，出墙报，张贴“小字报”。根据陈沂的回忆，“小字报”的内容主要批评山东分局及战工会，“事情虽小，原则提得很高，涉及山东分局、战工会的政策、法令、工作指示和工作作风，尤其对黎玉同志，有些近乎人身攻击”。墙报吸引了不少干部去围观。<sup>⑧</sup>

王若望的行为，自然引起了舒同的关注。几天之后，分局整风小组决定将王若望的发言定性为反整风文件的代表，山东的整风转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阶段，并组织斗争会，集中批判王若

①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党校第六期干部学习的决定》（1944 年 11 月 20 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3 辑（1944.9—12），第 188 页。

② 《关于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认识问题》（1945 年 4 月），萧华传记组、军事科学院《萧华文集》编辑组编：《萧华文集》上册，解放军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8—259 页。

③ 《罗荣桓传》，第 215 页。

④ 《关于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认识问题》（1945 年 4 月），《萧华文集》上册，第 259 页。

⑤ 《王若望自传》第 2 卷，第 295、299 页。

⑥ 《胶东托派案的审查总结及对胶东锄奸工作的初步总结》（1944 年 4 月 7 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100/007。

⑦ 《王若望自传》第 2 卷，第 336—338 页。

⑧ 《共产党员要按党章办事——从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谈起》，陈沂：《十年历程（1979—1989）》，百家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06—507 页。



望。批判会将王若望与延安的王实味联系起来,认为他搞的民主墙报同延安的《轻骑队》一样是反党性质的墙报。甚至有人提出了“打倒山东的王实味”的口号。正巧延安城市工作部来电称,抢救运动中有人供认王若望有国特嫌疑。于是,整风小组认定王若望是“钻进党内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国民党特务”。由舒同主持起草致山东军区的报告,指出王若望是“山东的王实味”,应援例交军区锄奸部门逮捕。但是,罗荣桓看到报告后向舒同表示这只是个思想问题,王不像是国民党特务。<sup>①</sup>在与王若望会面后,罗亲自主持会议,一方面批评王若望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一方面又提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反对将其上升到敌我矛盾。<sup>②</sup>如果没有罗荣桓的及时阻止,王若望的问题送交锄奸部门后,难免不会株连别人,山东甚至可能会出现类似延安抢救运动的肃反。

除了黎玉外,山东分局另一位常委萧华也在民主检查运动中受到了批判。据陈沂回忆,“山东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有一次他被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所包围,曾考虑突围还是谈判。考虑结果还是决定冲出去,而且胜利地冲出去了。这本不是什么问题,作为一个小战略区的负责人,有权考虑这样或那样的斗争方法。可有人硬揪住不放,并在山东分局的会议上说这位同志政治动摇,争论不休”。<sup>③</sup>这里所说的负责人最有可能的便是萧华。萧华是唯一一个从地方根据地负责人升任山东分局领导的干部,曾长期主持冀鲁边区和鲁西区。尤其是冀鲁边地区,国共日伪各方交错,也是山东最困难的地方。萧华对整风的态度与罗荣桓接近,对民主检查并不特别积极,并且反对教条式的反省,主张:“党对犯错误的党员是采取教育、爱护的态度,整风是思想改造,而不是组织上的打击。”<sup>④</sup>萧华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在民主检查中受到批评实属自然,最后还是罗荣桓出面为其解了围。

罗荣桓曾批评王若望,“把矛头针对着山东分局领导,你就攻击了山东分局,否定了山东全局。而这时山东全局是欣欣向荣的,是向上的。把黎玉的缺点、毛病无限上纲,不但伤害了黎玉同志,而且伤害了山东党的全局”。<sup>⑤</sup>当时在山东分局内部,罗荣桓虽是领导核心但常年患病,黎玉和萧华实际上是他的左膀右臂,分别具体负责党政与军事工作。如果黎玉、萧华都被批倒,则舒同的地位将大大提高。而罗为主,黎为副的领导格局,是经过刘少奇入鲁与领导一元化的推行才在山东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在罗荣桓看来:“有的人攻击黎玉,想从此打开一个缺口,攻击分局领导”<sup>⑥</sup>,此事闹大必将影响山东现有的领导格局,因此极力将事态淡化处理。不出罗荣桓所料,民主检查运动果然激化了干部之间的矛盾,孙汉卿回忆:滨海军区机关曾开大会公开搞“大民主”,“说什么只要不打人,什么方法方式都可用。于是,有人在大会上发言时,就对某一领导人进行谩骂、讽刺、挖苦,弄得这位领导同志非常不满,使领导内部加深了矛盾”。<sup>⑦</sup>滨海区正是山东分局与军区机关驻地,滨海领导层出现问题,自然需要山东分局引以为戒。

1944年12月6日,北方局在向山东介绍太行整风审干经验时,认为太行的审干与反奸搅在一起,整风一入门就进入坦白运动,坦白运动一开始就是反奸斗争,因此审干不深入,为此提出:

① 《王若望自传》第2卷,第338—343页。

② 《象罗帅那样对革命对同志》,陈沂:《五十年一瞬间》,第526页。

③ 《象罗帅那样对革命对同志》,陈沂:《五十年一瞬间》,第527页。

④ 谢有法:《整风和抗美援朝时期的肖华同志》,《回忆肖华》,第232页。

⑤ 《毛泽东谈整风审干和遵义会议——从对〈王若望自传〉中若干问题的说明谈起》(1992年8月12日),《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⑥ 《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588页。

⑦ 孙汉卿:《回忆罗政委领导整风片断》,《三帅在沂蒙》,第175页。

“整风中思想暴露没有到适当时机,绝不要轻易进入坦白运动,已进入坦白运动之后又绝不要把坦白运动轻易推进到政治性质的坦白阶段”,以便有时间“充分地暴露干部各方面的思想”,分辨干部哪些是“半条心或两条心”,哪些是“在半条心形式下可能掩盖着两条心的本质”。<sup>①</sup>实际上,此方针是号召用更充分地暴露来审查干部,甚至认为甄别阶段出现困难,就是之前暴露不充分,党组织掌握材料不够所致。舒同在山东搞的通过民主检查来暴露问题的做法恰恰符合北方局的方针。北方局也有在山东搞出整风审干新经验的意味。对此,罗荣桓多有担心,对身边的干部表示:“延安来人传达的整风审干的那套做法,在山东敌后根据地是不行的”,“整风、审干,是为了解决问题,是团结教育同志,不是对敌。不能以暴露思想来审干,‘大民主’就是对敌”。<sup>②</sup>

罗荣桓的工作特点是很善于在延安指示与本地实际中寻找平衡点。1944年12月21日,罗荣桓以个人名义向延安汇报山东整风审干的情况。<sup>③</sup>罗首先表示支持北方局的观点,承认民主检查运动暴露了领导上的问题,但也出现了不少偏差。罗荣桓一方面表示:“运动起来后,领导者更应冷静甚至遭到严重打击也不要轻易去干涉”,并通过积极分子收集会内会外的情况,一方面又提出领导干部思想上要有准备,骨干要先经过整风学习,顾及不同性质的组织,特别是军队。既不能脱离群众,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又不能失掉领导中心,尤其是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在报告中,罗荣桓提出通过民主检查来进行暴露的方式“不准备普遍地采用,只限分局、区党委、军区各级机关中进行,只限于鲁中、鲁南、滨海地区进行”。<sup>④</sup>原本民主检查运动是进行试点。罗荣桓不否认暴露方针,但又委婉指出试点结果并不理想,趁机将部分试点转变为只在小范围实行,特别是“一般战斗部队和县以下机关,目前不应发动”。<sup>⑤</sup>

至1945年初,整风运动在各地已普遍进入收尾阶段。在罗荣桓的主持下,山东分局于1月11日正式决定逐步结束民主检查,向以反省坦白为主要形式的审干防奸阶段过渡,并指出分局于1944年11月1日下发的整风审干补充指示是有问题的,应“坚持慎重方针,足够的估计敌人,同时又坚强的相信自己,反对自满麻痹,同时又反对夸大急性,反对自流盲目,同时又反对主观蛮干”。山东审干既进行坦白又开始初步进行甄别,“这次进行了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单位,应注意到过去上下脱节、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脱节的现象,以及某种对立情绪的存在。因而在进行反省坦白时,防止可能产生的主观成见与报复情绪,应当强调照顾落后分子。对这次暴露的各种材料,应仔细研究与慎重处理,只有与全部历史的、社会的各种材料配合研究之时,才有作用(但不是不重视这些材料)。目前对已经坦白的分子,应该进行初步甄别工作,分清是非轻重,审查其坦白过程’(有无逼供信),弄错了的可以翻案,避免夸大片面,不足的补充。号召他们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sup>⑥</sup>

由于胶东的运动过“左”,甚至有进行肃反的苗头,早在1945年1月8日,罗荣桓就指示胶东“民主检查暂时不必进行”,将“审干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军直各单位及个别有基础的地委一级

① 《北方局根据太行山附近一年来整风审干中经验简略的几点介绍》(1944年12月6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G001/01/0080/009。

② 孙汉卿:《回忆罗政委领导整风片断》,《三帅在沂蒙》,第175页。

③ 《罗荣桓口述、自传》,第298页。

④ 《罗荣桓关于整风审干的报告》(1944年12月21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G001/01/0073/011。

⑤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指示》(1944年12月12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1944.9—12),第264页。

⑥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目前审干防奸新的指示》(1945年1月11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4辑(1945.1—5),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146页。

机关)”,同时开始审查是否有“逼供信”的问题,以及坦白材料的真伪。<sup>①</sup>但要结束民主检查运动,最重要的是要征得延安的同意。鉴于山东分局内部,黎玉、萧华均受到民主检查运动的冲击。1945年1月28日,罗荣桓致电延安,告知萧华要求赴延安学习,黎玉兼任工作太多还请中央考虑增派人来山东,以加强分局与胶东区的领导,特别强调了“分局团结无问题,执行总的方针完全能够一致,但领导之间的分工与工作方式还存在一些缺点”。对舒同,一方面说他来山东对分局工作帮助很大,一方面又说其“了解情况还要一个时期”,暗指舒同不了解山东实际情况。最后,罗检讨了山东分局的工作缺点: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脱节;领导骨干与一般干部和群众脱节;盲目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在领导干部中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等。<sup>②</sup>通过此电报,罗荣桓实际上向延安指出山东好不容易形成的统一领导格局已被破坏,暗指责任是在舒同及其推行的民主检查运动。

此电报因涉及山东上层领导问题,果然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2月初,延安对山东1944年10月整风审干的指示和11月的补充指示提出了批评,山东分局表示完全接受。<sup>③</sup>由这两次指示所掀起的民主检查运动开始走向结束。1945年3月,罗荣桓主持分局会议,对山东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民主检查运动“偏向很大。如极端民主化,否认领导,攻击领导,侮辱领导,毁坏领导,不要组织,不守纪律等已成为一个时期的风气”,尽管也有一定的成绩,“暴露了领导上的缺点,警惕了领导上的自满麻痹,帮助了领导上改进作风,对树立民主作风打下了好的基础;同时使党内及全体干部的思想也来了一次总的表演”,但此后的整风审干“不采取过去的办法”,即不搞民主检查,而是“实行自我批评与批评的结合,由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反省”。<sup>④</sup>萧华也积极支持罗荣桓的意见,认为:“领导上对这一民主检查方针缺乏明确的认识”,“长期间对思想教育抓得不紧,在民主过程中又缺乏正确的掌握与指导,特别缺乏具体的组织领导,甚至助长某些偏向的发展”,强调整风的重点仍是思想改造。<sup>⑤</sup>

罗荣桓的报告实质上对山东整风运动进行了全面总结<sup>⑥</sup>,反映了他赞成整风审干,但不赞同以民主检查诱导干部暴露的方式进行审干。罗荣桓在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提到:“有的同志把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重点放在暴露思想、审查干部方面。他一定要搞,就先搞了个司令部、政治部,效果不好,以后就收了。否则不得了”,表达了对舒同的不满。为了与舒同的方法相区别,罗荣桓提出山东整风“以检查领导开始,以检查领导终结”<sup>⑦</sup>,实际上是以干部整风学习开始,以干部整风学习结束。整风的第一阶段本来就是学习,但随着运动转向审干及坦白运动的进行,不少地方的学习是停止的,甚至胶东区表示干部无须学习整风文件也一样能坦白得很好。<sup>⑧</sup>进入民主检查阶段,学习更是被忽略。直到1945年3月的民主座谈会召开后,罗荣桓提出不宜把民主检查与审查干部混同起来,而应采用分期分批进党校学习的方法,使整风重新回到学习阶段。<sup>⑨</sup>山东军区也提出:在

① 《对胶东审干的几点意见》(1945年1月8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胶东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②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402页。

③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406页。

④ 《关于民主检查的几个问题》(1945年3月),《罗荣桓军事文选》,第340—342页。

⑤ 《关于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认识问题》(1945年4月),《萧华文集》上册,第259—261页。

⑥ 谢有法:《整风和抗美援朝时期的肖华同志》,《回忆肖华》,第233页。

⑦ 《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588页。

⑧ 《胶东整风运动通报》(1944年10月1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G001/01/0090/012。

⑨ 梁必业:《罗荣桓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罗荣桓传》编写组编:《回忆罗荣桓》,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1945年“完成全体连以上干部的思想反省自传之后”，总结和分析干部思想状况，“以此进行对干部的思想教育”。<sup>①</sup>此后，山东的整风多集中在党校学习教育，直到中共七大召开后，“转入学习和贯彻党的‘七大’文件时才结束，历时近3年”。<sup>②</sup>

## 结 语

山东的整风包括学习与审干两个方面，以学习开始，经过审干，最终又回到学习。学习为审干提供了思想基础，审干是整风学习发展的必然逻辑。罗荣桓虽然提出了：“‘风’还是要整的，但应以整顿思想改进作风为主，不以审干为主。”<sup>③</sup>但在整风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仍是审干。审干原是中共一项经常性组织工作，但在整风中，审干发展成为一项运动，历经批评与自我批评、反省坦白运动、民主检查运动等阶段。一般研究认为康生所总结的整风、审干、肃反、抢救运动的整风运动阶段论，并不适用于山东。但实际上，这是中共革命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山东并不例外。随着审干日趋激烈，在胶东等地已发生了肃反。以群众大会及“逼供信”的方式进行审干的抢救运动也在山东一些地区出现，因此山东才需要在1945年进行甄别。整个中共的整风文化是一致的，差别只是不同地区领导人掌握延安政策的宽紧不同。罗荣桓在山东相对而言执行得不那么“左”，所以山东的整风，特别是抢救运动，时间较短，在规模上和激烈程度上相对较小。

中共在整风运动中，除了强调要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外，也强调思想与实践相结合。当时，除了整风外，中共也在各根据地推行大生产、减租减息等一系列运动。整风更侧重思想层面，其他运动更侧重实践层面，因此，整风也穿越于各个运动之中。例如根据胶东军区的报告，在大生产运动中，“从干部到炊事员，都参加劳动，是整风实行实践，干部亲身经验到劳动者的伟大与光荣，打破了认为劳动是耻辱下贱的观点，特别认识到了群众的痛苦”，改善了部队与群众的关系，干部战士共同劳动，密切了两者的关系，“干部战士关系打成一片”。<sup>④</sup>特别是通过整风与生产相结合，教育了一大批抗战时期加入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而这批人也恰恰是整风运动的重点目标。例如有知识分子干部就反省自己在生产运动开始时，还有英雄主义的情结，不断表现自己，结果事倍功半，才发现自己农业知识的缺乏，自此之后决心树立新的人生观，树立劳动的观念，从参加整风与劳动生产开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sup>⑤</sup>整风与劳动遂成为此后中共改造知识分子的主要方式。

罗荣桓在山东整风中抵制了舒同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毛泽东曾称赞：“山东只换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sup>⑥</sup>随着领导一元化与整风在山东的推进，罗荣桓在山东的地位越发突出。罗荣桓不仅以政治家而且以军事家的形象出现。据谢有法回忆，“从干部到战士，跟着罗走都有安全感”，从樊坝战斗、梁山战斗、鲁南打孔庄、白彦三次争夺

① 《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关于干部工作调查研究提纲》（1945年1月20日），总政治部干部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989页。

② 华楠：《山东纵队的整风运动》，《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中册，第237页。

③ 《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588页。

④ 《胶东军区生产开荒简报》（1944年6月），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1/01/0100/008。

⑤ 《山东省政委会秘书处各人在生产中的思想检查提纲》（1945年4月30日），山东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004/01/0050/0/05。

⑥ 王力：《毛泽东谈罗荣桓》，《春秋》1989年第2期，第19页。

战、留田突围、大谷台突围，一直到“攻郯城，克赣榆，取莒县，解放全山东，都有他的功绩”，而“陆房突围、白山建村遭遇战、大青山史无前例的损失，罗均不在场”，马牧池、南墙峪被围及兑谷峪突围罗也不在。<sup>①</sup> 罗荣桓提出的以“敌进我进”为核心的“翻边战术”<sup>②</sup>，也被毛泽东称为不仅是一种战术更是一种战略。<sup>③</sup> 一一五师政治部曾准备出版《战士》杂志，杂志创刊号的扉页上刊登罗荣桓的肖像。陈沂认为“这样做是同志们出于对山东党的领导人的尊重”，但罗知道立即加以制止，“杂志不要登我的头像。要登就登毛主席”。<sup>④</sup> 罗荣桓在山东威望的提高，客观上也巩固了战争环境下中共在山东的统一领导。

山东的整风审干，本质上是中共组织的一次纯洁化运动，分别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整顿，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领导一元化在山东的推行。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确立了其在中共全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这点在山东也不例外。原本罗荣桓来山东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就向山东党明确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在整风中，舒同来山东肩负着同样的任务。在山东军区军事会议上，舒同详细回顾了从“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受打击离开领导岗位，使中国革命遭受很大损失，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这段历程。罗荣桓作为亲历者，在苏区时因支持过毛泽东还受到过打击。军事会议召开时，罗正身患重病，仍激动地从担架上站起来说：“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错了吗？”<sup>⑤</sup> 罗荣桓在山东多次宣称“山沟里也能出马列”，1944年7月又亲自撰写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盛赞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武器”。<sup>⑥</sup> 罗荣桓的表态既促进了毛泽东权威在山东的树立，也让毛泽东对山东的情况更加放心。从山东的整风历程也可以看出整风运动在确立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郭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师资博士后〕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谢有法回忆，王汇川采访：《跟着罗政委最安全》，王汇川主编：《罗荣桓元帅功著山东》第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71页。

② 《象罗帅那样对革命对同志》，陈沂：《五十年一瞬间》，第521页。

③ 王力：《毛泽东谈罗荣桓》，《春秋》1989年第2期，第19页。

④ 刘汉、黄瑶等：《指挥山东军民大反攻》，王汇川主编：《罗荣桓元帅功著山东》第3辑，第328页。

⑤ 高克亭：《我的革命生涯》，第175页。

⑥ 罗荣桓：《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7页。



out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the base area in an all-round way. Among them, the four times of Rectification classes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Taihang District Party Committee, especially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time, were the key to the Taihang Rectific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process, the leaders of the base area mainly adopted the movement-style inner-party governance method characterized by bottom-up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but also combined with the top-down organizational means. During the period,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errors in cadre-examination, and it was not going well to finish the Movement, the leaders in general remained calm and rational, which could be said to be “out of focus but not out of control.”

### **Study, Cadre-Examination and Democratic Inspection: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of the CPC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 Guo Ning(72)**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began in 1942 and ended in 1945, including study and cadre-exam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the democratic inspection reached a climax, and due to Luo Ronghuan's restraint, it did not develop into a large-scale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Rectification and cadre-examination, in essence, was a purity campaign organized by the CPC,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cooperat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fied leadership in Shandong. Through the Rectification, Mao Zedong established his position of undisputed leader in the CPC, and Mao Zedong Thought became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whole Party. During Shandong's Rectification Movement, Mao Zedong's leadership position in the whole Party was highlighted, and Luo Ronghuan's leadership position in Shandong was also strengthened. It consolidated the achievements of unified leadership in Shandong, and ensured the absolute leadership of Yan'an over Shandong.

### **“An Expedient Measure:” The Re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Voluntary Group ..... Xu Liang(93)**

###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mpilation of Unit (A) 1855 of Japanese North China Dispatch Army ..... Zhao Yan(108)**

Unit (A) 1855 of Japanese North China Dispatch Army (also called Unit of North China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ater Suppl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quadron Unit 1855) was a unit for bacteriological studies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secretly built by Japanese aggressive army in North China. The continuing studies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since the 1950s have given us a considerabl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and crimes of the unit, but there are still divergent opinions on details such as the date, location of its compilation, the process of its building and establishment system, etc.,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not very clea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combining with the existing and other newly fou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article has made clear about the problems of the evolution, time of compilation and leaders of North China Area Army's Unit of Temporary Fiel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ater Supply, No. 1 Unit of Field Epidemic Prevention, Unit of Temporary Epidemic Prevention, Unit of Temporary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ater Supply, Unit of North China Epidemic Prevention, Unit of North China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ater Supply from July 1937 to March 1940, and confirms that Unit of North China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ater Supply Unit, e. g. Unit 1855,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direct participation of the Kwantung Army's Uni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it lasted for nearly three years.

### **A Study of Claims for Indemnity of the Privately-owned Steamship Industry in Shanghai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fter World War II, 1945 –1948 ..... Ma Zhenbo(130)**

### **How to Understand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Commentary on *From the Edge of the Stage to the Center* by Qi Xisheng ..... Hou Zhongjun(146)**